



赵红娟 著

明
遗
民
董
说
研
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赵红娟 著

所
遗
民
董
说
研
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遗民董说研究/赵红娟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9

ISBN 7-5325-4497-4

I. 明... II. 赵... III. ①董说(1620~1686)—人物研究②董说(1620~1686)—文学研究

IV. ①K825.6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1798 号

明遗民董说研究

赵红娟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875 插页 6 字数 420,000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25-4497-4

K·896 定价: 4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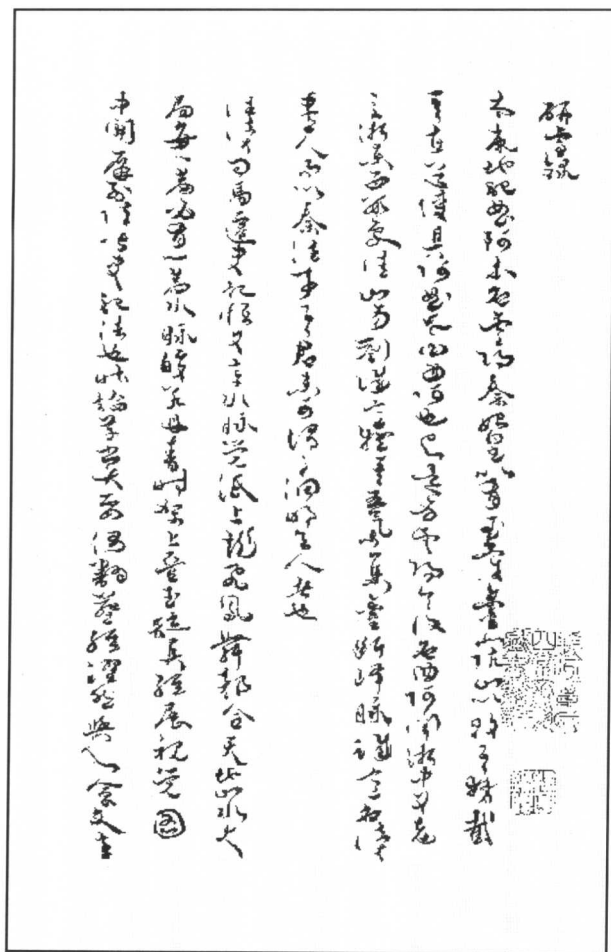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篋屋記

漏霜南潛

乙未十一月壬辰朔雲寒
寒思暮篋屋船為收拾雲山計筆倦不能作疏作暮
篋屋謹曰以瓦為屋錢不足以板為屋鬱心曲暮篋
屋嗟夫古人已去我欲但安如山層水複茗花綠
癸巳晴接日大詔喜曾來水壺寫余左傳略記喜曾且
西返寄書秋遂作投光溪山語日色厲昨有蛇出曝
於砌后此日飛豹脚 奮勤未翦鬚駭言塔院亞公病
甲午陰暖 宋時大相國寺前有道者賣一生決賭不
輸方歷歲月或不惜高價得之其誠方云捉贏吾亦

图一《篋屋记》手稿(藏国家图书馆)



图二《研雪录》手稿（藏国家图书馆）

豐草菴文集自序

往余病中痛念生死變姓名草衣芒屨走靈巖見
我師夫山和尚尚俯憐愁苦謂余天資近道許
隨衆入室名之曰玄潛字之曰俟菴乃草木數易
瞻道無涯無以承和尚遠大之期則玄潛負罪久
矣丙申復上靈巖叅請之暇草雜問十餘條披肝
露膽冀拔膏肓其一曰雁過長空影沉寒水正是
光影奔馳棒如雨點喝似雷奔猶屬門庭施設靈

图三 《丰草庵文集》书影（清康熙繁露堂刻本）



图四 湖州南浔董家百间楼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张其成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先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

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

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

《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and 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

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绪 论

董说(1620—1686)天资颖悟,学识渊博,一生著作达一百余种,涉及天文象数、史学年历、文字音韵、音律诗学、佛教禅宗、医学杂览、诗文小说等众多方面。其才既高,性又偏狂,更遭家族没落,衰世鼎革,故心多愤激。他常恸哭,常后悔,好立誓,好手评古书,嗜焚书,嗜做梦,嗜游山,有舟居之癖、听雨之癖、题名之癖、改名之癖,津津乐道于采杉、制香、造墨,直至最后心灰意冷,遁迹空门。虽非顶级大儒、大文学家,却实在是一位十分独特而又不失典型意义的学者、文人。相与赏析者,有黄周星、徐枋、金俊明、顾有孝、陶仲调、巢鸣盛、张履祥、郭都贤等,“皆遁世无闷而与先生善”^①。又为复社领袖张溥受业弟子,大受师赏,“江左名士争相倾倒”^②,“当世名流,俱以不识先生为耻”^③。明亡后,志节之士有托而逃,率以灵岩弘储和尚为依皈。顺治辛卯(1651)之难,灵岩寺中星散,独董说负篋杖策,入山以从,“由是东南名宿,日高其行”^④,遂与沈麟生、熊开元并称。正式出家后,所至之地,缙素

①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七。

② 周庆云《南浔志》卷一八。

③ 同上卷五一。

④ 同上卷四七。

宗仰，“海内无不推月涵为禅门尊宿矣”^①。

然而，这样的一个人物、学者、名士、遗民、高僧，却几乎成为研究的空白。学术界关注的仅仅是他的小说《西游补》。而文学研究者研究《西游补》，也是因了它是《西游记》的续书，因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它的高度评价。况且董说的文学研究者也还是少得可怜，除刘复《〈西游补〉作者董若雨传》外，多集中在对《西游补》思想与艺术的分析上，或《西游补》的作者到底是董说还是其父董斯张之争上。没有人真正深入关注过其厚厚六大册的《董若雨诗文集》，寻找过其《楝花矶随笔》、《丰草庵别集》、《篋屋记》等著作的下落，因而也无人论及其心路历程、诗文成就、学术地位等。可以说，从思想史、学术史、诗歌史、心理学角度考察董说都是空白。

这种研究的空白，颇值得思考。首先，董家在董说父亲董斯张时即已衰弱，董说又不过是一个秀才，无仕途经历。其次，鼎革之际，董说仅二十余岁，虽多遗民的奇行异迹，但绝非能如顾炎武、黄宗羲那样活跃在明清之际的那个前台，成为遗民中的最强音。当然，更重要的是，董说是一个才气纵横的病态的贫士，习惯以文学的方式表述自己，习惯于保持低调。其晚年的著作不愿示人，大都散佚不传。另外，他也不如徐渭幸运，有大文学家袁宏道为之张扬。但今日之受冷落，还是颇令人奇怪，也许只能用历史偶然的疏漏来解释了。

据笔者统计，目前关于董说与《西游补》研究的专篇论文有七十余篇，专著两部。其中，除专论董说生平交游的几篇论文外，其他所有的论文及两部专著都集中在《西游补》的研究上。而《西游补》的研究热点则主要集中在小说作者与写作时间的争论、小说

① 钮琇《觚剩续编》卷二。

内容与主题的探讨、小说的创作手法与技巧三个方面。

一、关于《西游补》的作者与写作时间

《西游补》这部小说在作者和成书年代上均有不少争论。关于其作者有两种说法,即董说和董斯张。最早认定《西游补》为董说所作的是与董说大致同时代的钮琇,其《觚剩续编》卷二曰:“吴兴董说,字若雨……余幼时曾见其《西游补》一书,俱言孙悟空梦游事,凿天驱山,出入庄、老,而未来世界历日先晦后朔,尤奇。”此后,嘉庆间焦循《剧说》卷五、咸丰三年(1853)天目山樵《西游补》序、黄人《小说小话》、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刘复《〈西游补〉作者董若雨传》、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以及各种文学史、小说史等一致认为《西游补》为董说所作。新论的提出,始于高洪钧1985年发表的《〈西游补〉的作者是谁》一文。该文认为《西游补》的作者并非董说,而是其父董斯张。其最主要的一个证据是,《西游补》崇祯刊本署“静啸斋主人”,而静啸斋是董斯张的室名,斯张有不少著作就以此命名,如《静啸斋吃》、《静啸斋存草》等^①。傅承洲、王洪军也力主此说,见傅承洲《〈西游补〉作者董斯张考》(《文学遗产》1989年第3期)、王洪军《董斯张:〈西游补〉的作者》(《广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8期)。另外,王星琦《恣情纵笔任横行:〈西游补〉读札》一文也主张作者为董斯张。他说《西游补》“应是作者晚年作品,说是斯张所作,若雨修订、整理,庶几可信”^②。此后,学术界有的学者

① 高洪钧《〈西游补〉的作者是谁》,《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6期,第81—84页。

② 见王星琦《恣情纵笔任横行:〈西游补〉读札》,《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1期,第178页。

发表研究《西游补》的文章,就有直接题作董斯张的^①。

高洪钧、傅承洲的观点遭到了冯宝善、徐江的驳斥。他们的一个最有力的观点是,现在并没有文献可直接证明董斯张曾使用过“静啸斋主人”这一名号,因此不能凭推测论定静啸斋主人即董斯张^②。另外,苏兴《〈西游补〉的作者及写作时间考辨》(上)一文通过细密考证,亦认为“董说作《西游补》,不必怀疑”^③。田干生《〈西游补〉作者之谜》(《文史杂志》2003年第2期)一文在全面回顾了以上争论后,则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认为父子俩均有可能是该书作者。

《西游补》究竟是董说还是董斯张所作?通过对董说与董斯张的全面考察,笔者以为《西游补》当为董说所作。除了冯宝善、徐江、苏兴先生的众多论据外,还有以下三个内证:一是董说的散文集《丰草庵前集》与《丰草庵文集》在大量罗列同类型短语、大量排比句子与段落这一点上与《西游补》有惊人相似之处,而在董斯张的《静啸斋遗文》与《吹景集》中却绝无此特点;二是董说可以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大最奇异的梦癖者,其嗜梦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西游补》作为一部探讨梦境的小说,其内容及艺术与董说的梦有诸多相似之处;三是《西游补》中流露有董说的口吻与思想,并出现了董说《楝花矶随笔》中记载的名物驱山铎。

董斯张卒于崇祯元年(1628)年,《西游补》若为其所撰,自

① 见何良昊《〈西游补〉的谦与傲》,《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第345—354页。

② 见冯宝善《也谈〈西游补〉的作者》,《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2期,第235—240页;徐江《董说〈西游补〉考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4期,第53—57页。

③ 苏兴《〈西游补〉的作者及写作时间考辨》(上),《文史》第四十二辑。

然是成于明亡之前。王星琦《恣情纵笔任横行：〈西游补〉读札》在批判无名氏反清排满说时，即言：“这种如猜谜射字的索隐令人茫然”，“况且书刻在崇祯间，若为斯张所撰，就更搭不上界了”^①。但董说跨了明清两朝，《西游补》的成书时间因有明亡前与明亡后两说。主张董说作于明亡前的有鲁迅、刘复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曰：“全书实于讥弹明季世风之意多，于宗社之痛之迹少，因疑成书之日尚在明亡前。”^②刘复《〈西游补〉作者董若雨传》：“《诗集》卷二有若雨庚寅作《漫兴》诗十首，第三首中有句云：‘西游曾补虞初笔，万镜楼空及第归。’自注云：‘余十年前曾补西游，有万镜楼一则。’庚寅是若雨三十一岁（顺治七年，公元1650），从此倒推上去十年是庚辰，若雨二十一岁（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这时候明朝还没有亡。许多人以为《西游补》是明亡后所作，从而有种种的揣测，现在找到了这个证据，可以把所有的揣测一扫而空了。”刘复1927年的这个考订后来被学术界普遍采用。目前关于董说与《西游补》研究的两本专著，傅世怡的《西游补初探》和 Brandauer 的英文本《董说评传》均作此说。

主张明亡后作的学者有黄人、寒爵、柳无忌、苏兴等。黄人《小说小话》认为《西游补》作于明清鼎革之后，是董说“身丁陆沉之祸，不得已遁为诡诞，借孙悟空以自写其生平之历史”^③。寒爵《〈西游补〉创作的时代背景》一文说：“《西游补》产生于明室覆亡之后，作者既激愤于异族的侵略，又慨叹于故国政治的腐

① 见王星琦《恣情纵笔任横行：〈西游补〉读札》，《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1期，第167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48页。

③ 转引自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328页。